

海南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 于保霞 刘政

摘要：居民幸福感的高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据课题组对海南省居民抽样调查研究得出：收入较高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较低的样本组；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平均居民幸福感是提高的；经济发展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低是拖累海南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海南省居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收入 居民幸福感 实证研究

对幸福感的最初量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David Hume 曾经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居民幸福感是评价一个社会经济福利状况的重要指标，居民幸福感的高低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从 2001 年亚洲博鳌论坛建立到 2010 年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在庆祝 2018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区，支持海

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党中央和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支持海南经济发展。海南经济总量得到大幅提升：从 GDP 总量来看从 2006 年超 1,000 亿元到 2019 年 5,308 亿元。海南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主要指标增速快于全国、好于预期。

但海南居民对这些宏观政策的参与感与获得感并不强，随机采访的海口市居民比较一致的感觉是，国家的政策好，对海南的支持力度大。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大幅度提升，2018 年，海南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79 元，月均 2,048 元；2019 年，海南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679 元，月均 2,223 元。

201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33 元，海南未达到平均水平。居民并没有从国家的宏观支持政策中获得参与感与幸福感，居民的低可支配收入成为了增强海南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制约因素。

课题组以已经公开的政府统计资料和对 2010-2019 年海南省居民幸福感的持续关注调查为依据。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抽样法从海口市随机抽取城市居民 200 名作为被试者进行问卷调查（注：因为研究主要讨论居民幸福感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在校大学生不属于有收入群体，所以样本中去除在校大学生；海南地域特征过于明显，“候鸟”群体占据一定比例，休闲度假的人来

* 基金项目：海南省教育厅 2018 年科研项目：经济学视角下海南居民幸福感研究（项目编号：Hnky2018-63）。

海南的主要目的为享受海南优美的气候环境，所以会对其他因素弱化，所以在选择目标调查的时候也考虑了海南“候鸟”群体的比例)，其中有效问卷 173 份，有效回收率 86.5%。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海南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关系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年龄，最小者为 18 岁，最大者为 72 岁；样本学历层次，涵盖了初中及以下到博士各学历层次。男性 85 人，占总样本的 49.1%，女性 88 人，占总样本的 50.9%。

本次调查中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是：“总体而言，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感觉是怎样的？”答案分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五个等级。只有 8.1% 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有 46.8% 的人选择了“幸福”和“非常幸福”，45.1% 的人选择了“一般”，这说明了我省居民总体上来说是一般偏幸福的。

一、按照不同的收入对样本分组，收入较高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较低的样本组

在样本数据中，受访者最低收入仅为 1,500 元 / 月，受访者

中最高收入为 20,000 元 / 月，其他高收入群体没在本样本数据中，所以本样本数据可能有一些瑕疵。此次调查按收入共分了四个组：2,000 元 / 月，样本数为 22 人；2,000-5,000 元 / 月，样本数 63 人；5,000-10,000 元 / 月，样本数 54 人；10,000 元以上 / 月，样本数 34 人。对不同收入分组的样本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收入较高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一般高于收入较低的样本组。但是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 / 月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又低于收入 5,000-10,000 元 / 月的样本组。因此，据本样本观测数据显示，居民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居民幸福感与收入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其具体的相关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这一实证结果可以用 Cummins 的观点解释，Cummins (2000) 指出，收入是维持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个人都需要一定的收入来购买供个人及家庭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个人是不会考虑是否幸福这样的问题的，特别对穷人来说更是如此。贫穷的人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自己所需的各种资源，较小

的收入变化就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较大改善，因此，收入较高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较低的样本组。

在本样本数据中，收入 2000 元以下 / 月的样本数 22 人，占据了总体有效样本数 12.7%，反映了目前海南居民中收入偏低占比人口还比较多，其幸福感较低，据笔者之前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这部分人的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 60% 以上，其收入基本都用在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上，基本上谈不上幸福感。然而，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也有一个最高极限，一旦达到这个极点，收入的增加将不会影响幸福感的变化。这个极点值为多少不同的学者的研究有不同的结论，在本研究中，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 / 月的样本组平均居民幸福感水平又低于收入 5,000-10,000 元 / 月的样本组。在本次样本调查中，收入 10,000 元以上 / 月的样本数 34 人，占据了总体有效样本数的 19.6%，反映了海南居民较高收入群体也比较多，这些人用经济学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已经达到了温饱自由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在他们的幸福感观念中，幸福与收入已无直接关系。据此，

初步判断海南居民幸福感收入对幸福感的极值点出现在人均收入10,000元左右，具体数值有待进一步的实地调研和实证研究。这一实证研究结论也与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相一致。

二、按照受教育程度对样本分组，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平均居民幸福感是提高的

在样本数据中，初中及以下人数为35人，占了样本数据的20%，最高学历为博士3人，含在硕士及其以上分组内。此次调查接受教育程度分为了四组：初中及以下样本数35人；高中（含中专）样本数46人；本科（含大专）样本数75人，硕士及以上样本数20人。据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平均居民幸福感是提高的，初中及以下者幸福感最低，其均值为3.113，本科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的平均居民幸福感最高，为3.431。这是由教育的收入效应引起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一般会有较高的收入，高收入带来了高幸福感。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益就越高，收益包括了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指从终生收入来看，

上大学的一生得到的收入总量高于没有上大学的人。非经济收益包括由于上大学而得到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展所带来的生活兴趣的广泛等。据笔者之前做的一项关于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调查分析可知，以2000年开始上大学为例计算上大学的总成本和总收益，上大学的总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指学杂费、书本费等，是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发生的费用和间接成本，也称为机会成本，是由于上学而无法去工作而放弃的收入）为83,675.24元，总收益（上大学期间可能获得的奖学金、兼职收入和大学毕业以后的预期报酬）为728,571.07元，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净差额即上大学比不上大学高中即参加工作的人一生收入总量高644,895.83元。

但是统计分析中也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硕士及以上的受访者的平均居民幸福感（3.198）只接近高中教育程度的受访者的平均居民幸福感（3.205）。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反而更低，这一结论需要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人生预期和预期的实现来解释，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对自身的预期和人生目标要求也会越高，当其人

生目标与目标的实现存在较大的差距时，反而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曾经有海南某大学教授调侃自己说去菜市场买菜专挑便宜的菜买，贵一点的排骨、牛肉、海鲜等很少买，买不起。还说她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大学教授吃不起牛肉，颇有调侃的意味。该教授说这样的话想表明的观点有两个：一是海南蔬菜、肉类等生活必需品价格过高，生活成本高；二是作为高学历人才的大学教授的收入过低。诚然，对大学教授来讲，吃不得起牛肉固然不能与幸福感等同，但从这种调侃中可以反映出教授的预期与现实的差距，当这种差距越大时，对其幸福感的影响也会越大。

三、性别、年龄对幸福感的影响

从样本数据初步判断得出，女性幸福感均值为3.298与男性幸福感均值3.306基本持平，这与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系统“居民幸福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该课题组的研究结果为女性的客观幸福指数和幸福满意度略高于男性。这与官皓的研究结果也不同，官皓的研究结果

为：平均而言，男性的幸福程度为 3.37，而女性的幸福程度为 3.46。主要原因：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女性本是多把精力放在经营家庭、忙于家务方面，但海南特殊的文化习俗所致，“女耕男儒”“女耕男商”“女耕女织”“妇女负贩”在海南传统社会中颇为流行，女性则在海南的农耕、编织、墟市贸易等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了主角。目前海南女性在田间劳作和挣钱养家方面仍承担主要责任，这从海南出名的“老爸茶”现象可窥一斑（田里，各种繁重的体力活都是女人在做，一到下午三四点，老茶馆便座无虚席，更奇怪的是，这儿悠闲地翘脚喝茶的都是一些中年男人。因此，人们把他们喝的茶称之为“老爸茶”）。

据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居民幸福感和年龄之间存在“U”型关系。居民幸福感随着年龄先减后增，青年人和老年人幸福感相对较高，中年人幸福感最低。Blanchflower&Oswad 的研究也证明年龄和幸福之间存在着 U 型曲线关系，而且临界点在 40 岁左右，王岩的研究（2015 年）证明年龄的拐点为 40.5 岁，本研究与以上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与中年人的生活状态有关，中年人上有老

下有小，已经成为一家的顶梁柱，需要为全家生活生计承担责任，生活压力大，相应地，中年人的幸福感也就较低，据样本观测 31-40 岁的幸福均值最低，仅为 3.053。海南独特的气候和温泉资源等都非常适宜老年人居住，海南的候鸟老人比较多，他们一般在前一年的国庆节期间来海南，次年的五一节回到原居住地，海南的长寿老人也较多，海南澄迈是“长寿之乡”，海南省也素有“长寿岛”之称。老年人往往会弱化其他感受，更多地满足于自然生态环境，据样本观测 60-70 岁及 70 岁以上的幸福均值最高，分别为 3.403 和 3.601。

四、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开放式问题，经济发展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低是首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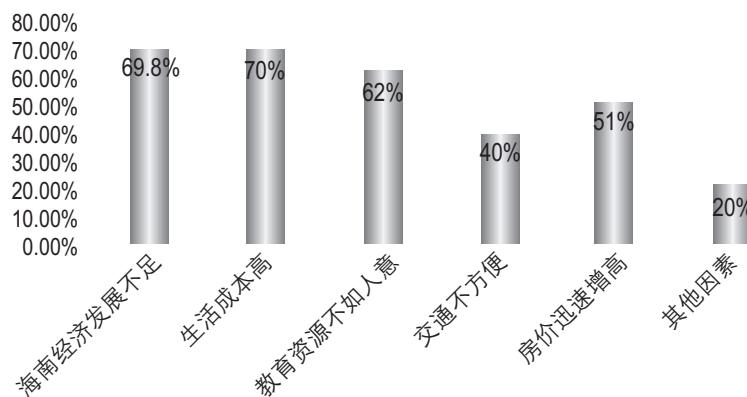
在开放式问题中，请被访者描述拖累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通过统计问卷得出经济发展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低是首要因素。据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2017 年海南人均 GDP 仅为 48,430 元，远远低于 2017 年全国人均 GDP 水平（59,660 元），处于全国中下游行列。2018 年海南 GDP 总量为 4,832.05 亿元，位居全国

31 省份的第 29 位，甘肃、海南、宁夏、青海、西藏是全国仅有的 5 个 2018 年 GDP 总量不到万亿的省份。在问卷中“您认为影响当前海南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哪些？”69.8% 的问卷首选海南经济发展不足。

生活成本高和教育资源不如人意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被访者谈到生活成本高的最重要的表现是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蔬菜、肉类等基本生活用品价格过高，海南是全国冬季瓜菜生产基地，但海南岛内居民却吃着全国最贵的蔬菜，据一些经常活跃在菜市场的候鸟老人说，海南蔬菜价格比北京、上海等全国最发达的城市的价格都要高。据海南省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海南省部分重要商品零售价格监测日报显示，2020 年 5 月 15-21 日从全省 26 个农贸市场采集的数据显示，蔬菜类西红柿价格维持在 5.15 元 / 斤左右，菜心价格维持在 4.53 元 / 斤左右，蒜苔价格维持在 6.13 元 / 斤左右，鲜果类苹果价格维持在 8.96 元 / 斤左右，鸡蛋类价格维持在 6.94 元 / 斤。在问卷中 70% 的被访者认为，海南生活成本高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高房价目前也是海南居民幸

图1 拖累海南居民幸福感的其他因素



福的很大障碍，据实地访谈，居民对住房的满意度为 51.3%，尤其对海南近十年来阶段式上涨不满意，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希望政府能解决居民收入低、房价高问题。

结论：要提高我省居民的幸福感，增加居民收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

增加居民收入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 充分抓住海南建设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机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工资水平。一方面要让企业能够正常运转，另一方面要让民间保持充沛的创业精神。政府应当满腔热忱支持民间的创业精神，并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尤其要注意的是，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群体是自己经营“小生意”，属于个体工商户或者小微企业，他们在社会经济中也承担了重要角色，属于需要增加收入的居民群体。因此，给予小微企业良性经营

的政策建议、在融资等方面适当支持等措施可以提高小微企业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收入。2. 降低生活成本和压力，海南 CPI 近些年在全国持续偏高，海南 CPI 高的主要原因有：食品价格高带动，住房中的房租因素推高等。解决海南高物价问题需要对症下药：构建高效完备的商贸流通体系，降低流通成本，持续对房价进行调控，坚持住房不炒房，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港）的政策优势降低税收等，从根本上稳定物价。通过减少生活成本和压力方面增

加居民的可支配性收入，增强海南居民幸福感。3. 提高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大力发展经济。经济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应充分发挥海南独特魅力，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引进人才。

居民幸福感与收入有对应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幸福感是以一个主观变量，如经济学中对效用的讨论一样，因人因地而异，文中所讨论的居民幸福感与收入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对策是抽象问题的一般论述，可能对单个个体不适合，但适用于整体居民幸福感的研究。■

本文作者：
于保霞 海南广播电视台财经
教研室讲师
刘政 海南省三沙市发改委主任
责任编辑：王云峰

参考文献：

- [1] 管皓. 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 (5)
- [2] 王鹏. 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3).
- [3] 任国强, 桂玉帅, 刘刚,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 [J]. 经济问题探索, 2012(7).
- [4] 鲁元平, 王韬.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11(4).
- [5] 钟献兵, 收入对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J]. 时代金融, 2017(12).
- [6] Easterlin, R. A.,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J].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473): 465 – 484.